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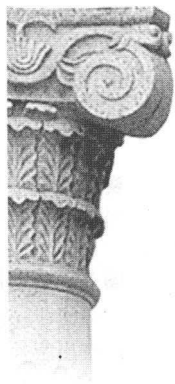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 刘若愚及其研究

ZHONGXIBIJIAO SHIYU XIA DE
LIURUOYU JIQI YANJIU

邱霞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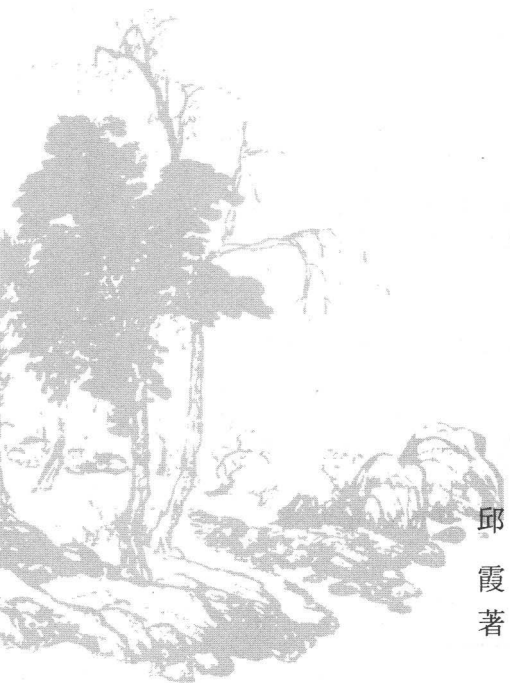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 刘若愚及其研究

ZHONGXIBILIAO SHIYU XIA DE
LIURUOYU JI QI YANJIU

邱霞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责任编辑：罗 慧
封面设计：张 冀

责任校对：董志英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刘若愚及其研究 / 邱霞著. —北京：知识
产权出版社，2012. 3

ISBN 978 - 7 - 5130 - 1146 - 4

I. ①中… II. ①邱… III. ①刘若愚(1926~1986) - 比较
文学 - 文学理论 - 研究 IV. ①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8193 号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刘若愚及其研究

邱 霞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345

印 刷：北京富生印刷厂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一版

字 数：231 千字

ISBN 978 - 7 - 5130 - 1146 - 4/1 · 208 (4032)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 - 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luohui@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0.5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邱霞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完博士学位，即到复旦大学做博士后。在这期间，她对她的博士论文《刘若愚学术著述研究》作了修改，文稿从上海寄来，嘱我作序。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于此无可推脱，不得不花些时间重新阅读邱霞重新修改后的论文。

我本人很早就读过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对其所论的中国古代文论问题，很有兴趣，对其著作中所表现出的学术造诣，印象深刻。刘若愚教授是北京人，1926年生，比我仅大10岁。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北平，他艰难地度过了8年抗争时光，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业，毕业于当时的北京辅仁大学。随后在清华大学短期攻读硕士，曾任清华大学“新批评”大家燕卜苏的助教，出国前就受到了“新批评”的熏陶。后留学欧洲，在英国获硕士学位。刘若愚虽后来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加入美国籍，但他对自己祖国的文化和生养他的故乡，抱有热爱和思念之情。1982年他回北京，写下了《访儿时故居》：“陋巷依稀旧日痕，燕京春暮尚多尘。萧条寂寂墙头草，剥落斑斑院外门。母唤儿啼犹在耳，玉箱茶案已无存。伤心四十余年事，俯首徘徊欲断魂。”从这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刘若愚对故园的一片深情。正因为他时刻眷念着自己的祖国和文化，所以每当在

外国读到或听到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歧视和诽谤，总是愤愤不平。与此同时，就是在西方做学术研究的中国的汉学家，也常有自卑心理，在新中国成立前那种西方中心主义冲击下，在中国政治与经济落后的双重劣势下，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事不如人，事事不如人。他在国外的这种生存状况，正可作为理解刘若愚一生及学术途径。他为什么总是用英文写作，而且常常不是面对中国文化研究者写作，而是面对一般外国的英文读者写作，换言之，他总是把只懂英语的人当成他著作的预设读者。显然，他这样做是力图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竭尽全力使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真实地、客观地呈现于异邦，以使外国人能理解中国和中国语言文化、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学理论，从而开辟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的途径。只有了解刘若愚的这些情况，才能理解刘若愚一生著作的发展轨迹。

邱霞的博士论文就是从这样的历史语境切入，深入展现刘若愚的学术世界。她研究了他一生留下的8部书，分成四个章节全面地整体地来介绍刘若愚的学术贡献。她的这种选择是很明智的，也是很有价值的。

邱霞博士论文的第一章是对刘若愚第一本书《中国诗学》的评述。这本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书，于1962年出版。刘若愚著作的第一章竟然反常地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谈论中国语言，尤其是汉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之一就是西方人对汉语和汉字有误解，甚至认为汉语这种没有“性”“格”的变化，形容词没有级别，动词则没有“语态”“时态”“人称”“单复数”的限制……这种语言“正像夏天的酷热自然要引起午睡一样”，会招致“思绪混乱”。刘若愚正

是针对这种状况，在他的《中国诗学》第一章中大谈中国语言的特点，大谈汉字的音、形、义，把汉字的六种造字法，一一详细道来。刘若愚说：“严肃的文学批评必须讨论到语言的各个方面，正如严肃的绘画评论必须讨论颜色、线条、形状一样。”邱霞这样来评论《中国诗学》的第一章：“中国诗学语言论作为该书第一章不仅是全书的根基，事实上也是面向西方讲述中国古代文学、诗学时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障碍。”这种评论深得刘若愚的思考实际，邱霞的论文从“为汉语一辩”开始也就理所当然了。

邱霞博士论文的第二章是“刘若愚中国文学鉴赏论”。本章介绍刘若愚《中国诗学》《中国之侠》《李商隐诗》《北宋主要词人》《中国文学艺术精华》等学术著作。刘若愚在英语学界对中国文学艺术进行了空前的阐释，当然在阐释前需要让英语读者正确了解中国文学艺术的内容和特点，这样做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邱霞的评价是：“在用英语阐释上述中国文学的过程中，刘若愚的独特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两点：第一，突破中西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模式，在中西并举中凸显中国文化精华。第二，中西结合的阐释方法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阐释注入了新的活力。”邱霞的这个评价是很到位的。的确，要理解一个陌生的东西，就需要依凭，离开了这个依凭，完全孤立的描述是不会获得成功的。中西文学尽管是不同的，但也有相通、相似之处，所谓“中西并举”，就是揭示出这些相通、相似之处，把英语读者领进了解中国文学的道路上来。邱霞的论文指出，刘若愚对于中西诗歌中，关于“自然”、关于“爱情”都有丰富的描写，这里有相通的部分，也有完全不同的东西。邱霞引了刘若愚著

作中的论述：中国诗歌中的“自然”与西方诗歌中的“自然”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中国诗人如陶潜、王维作品中的自然不同于与英国自然诗人尤其是华兹华斯笔下那样是造物主形而下的显示，而是其自身、“nature”中译可以是“大自然”，或“自一然”（self-thus）。而中国人的心也似乎满足于把“自然”当做一个事实加以接受，而不去探求“第十天”。即是说，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本然的存在，它的后面没有支配它的看不见的动力，没有高于自然的“上帝之城”。因此中国诗人们不从特定中个别人的视角来观察自然，而是把“自然”当做永远如此的东西来观察。中国诗人“以情观物”，自己就隐没或投射在自然中。一片叶子、一只小鸟，其中都有自己的情感隐含在期间，情融于景，景含着情。这样的“中西并举”，也就可以使英语读者了解中国人眼中的“自然”是什么，与西方文化所熏染的“自然”有何不同。

在邱霞的论述中，还认为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研究“凸显中国性”，如对中国诗歌中“时间”“怀古”“乡愁”和“游侠”等主题就比西方文学有更特殊的关注与展开。这些解释，都有利于突出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研究更符合中国文学的实际，更凸显出中国文化自身的特性，也清楚地揭示了刘若愚的研究的初衷。此外，邱霞对刘若愚关于如何把汉语翻译成英文，是走“归化”的道路，还是走“异化”的道路等问题，也都有深入的讨论与评析。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邱霞对于刘若愚阐释诗的模式——刘若愚拒绝从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语境入手去解释诗歌，而总是力图从作品本身或作家的系列作品为依据解释评价作

品，作了很好的介绍。刘若愚的阐释诗歌的模式当然主要是“新批评”的模式，这种模式把文本孤立起来，不与历史语境相联系，这肯定是有缺憾的。但这一模式的优点是发挥解释者的主体认知、理解、联想和想象，会给文本的解释带来全新的向度。如刘若愚对李商隐著名诗篇《锦瑟》一诗所作的解释中，他否定了前人的悼亡、自伤、寄托诸说，而提出了古今中外都有的“人生如梦”的新说。如果重读一下《锦瑟》，思考一下刘若愚的新说，那么他的解释是不无理由的。

邱霞的论文对于刘若愚的诗学理想的阐释，也下了很大工夫，是她的论文中比较精彩的部分。她把刘若愚的诗学理想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刘若愚的诗学理想致力于中国古代诗学和西方诗学的综合，力图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新论。可以说，在他的诗学理想的成熟期，既吸收了中国古代严羽、王夫之、王士禛和王国维的“妙悟主义”的养分，也融合了马拉美、艾略特、瑞恰兹、燕卜苏、艾布拉姆斯、杜夫海纳、英伽登等西方诗人、理论家的某些思想，形成一种新的综合。在他的成熟期，认为“诗是语言结构和艺术结构的复合体”。他指出：“一件文艺作品是指涉的，也是自我指涉的，是离心的也是向心的，是能指也是所指。换句话说，一件文艺作品的字句结构，既超越它本身同时也将注意力引向它自身；在超越本身时，它现出创境，那是现实的扩展，而在将注意力引向它本身的过程中，它满足了作者与读者的创造的冲动。”显然，他的这一诗学理想，的确吸收中西诗学，又超越了中西诗学，从而把诗学理论引向一个新的境界。邱霞对此的评论说：“这一切也与新批评过分强调细读，崇拜作品本体，追求完全客观的鉴赏标准拉开了距

离。”这个评论是准确的精当的。的确，刘若愚后期开始摆脱“新批评”的影响，不再把文学看成是“内部”的，他看到了“内部”和“外部”的互动和互构，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邱霞博士论文的第三章，专门讨论刘若愚对中国诗学体系的研究。刘若愚面对的是英语读者，他必须跨越三大障碍：语言的、文化的和体系的障碍。如果不讲中国诗学体系，一味地讲“道”“性”“气”“风”“骨”“神”等字句，那么习惯于阅读有概念、有推衍和体系的理论著作的读者，就会觉得中国诗学太神秘，太不好理解，所以刘若愚不得不建构中国诗学体系。当然，他也认为中国诗学是有潜在的体系的，只是未被整理出来，所以刘若愚不得不在建构中国诗学体系上下力气。他的研究是有结果的，在《中国诗学》一书中，他提出了中国诗学的四种理论：第一种，道学主义的观点，作为道德和教训的诗，代表的主张就是先秦以来的美刺、讽谏等；第二种，个人主义的观点，作为自我表现的诗，代表的主张是“诗缘情”、抒写“性灵”等；第三种，技巧主义的观点，作为文学练习的诗，代表的主张是黄庭坚的“脱胎”“换骨”等；第四种，妙悟主义者的观点，作为默察的诗，代表的主张是严羽的“妙悟”“入神”以及王夫之的“情景交融”等。邱霞的论文指出，刘若愚本来可以用西方的术语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形式主义”和“象征主义”这些西方人熟悉的术语来表达，因为这些西方的术语与他概括出来的术语有接近之处，但最后还是考虑到中国诗学自身的特色，而放弃那些西方的术语。邱霞说：“在中西比较诗学的最初阶段，刘若愚就表现出对随意套用

西方术语的警惕，这一态度在今天看来都极有启发意义。”这一简要的评点，不但说明了刘若愚诗学研究的特色，而且对于研究中西诗学比较的学人真的具有启示意义。

在这一章的后面部分，邱霞介绍了刘若愚成熟期的中国诗学建构。刘若愚吸收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图式，加以改造，并从改造过的图式里，提出了中国诗学的六种形态，这就是：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论和实用论。结果这个新的构想遇到了中外学者的一些批评，形成争论。邱霞用了很长的篇幅介绍争论。批评者的声音，主要是认为这个中国诗学六论“只见概念，不见历史”；有的说得更过分，认为刘若愚的这种说法是“美国社会文化的产物”，这已经属于扣帽子了。邱霞用了很大的力气为刘若愚辩护，其辩护的理由主要有：（1）刘若愚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凸显中国文论的“中国性”，他提出的“六说”建立在对中西文论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并不是简单地从那个图式里空穴来风地引出来的。（2）刘若愚在面向英语世界讲述中国文学理论时，始终把中国当成自己的文化据点，尽管他本人时常希望超越种族和文化，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中西两种文化，在远离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要远离汉学中心主义。（3）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不能完全采取古代评点式那一套，要与时俱进，焕发出新意，别人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刘若愚不可以这样做。（4）刘若愚致力于寻求的是超越历史和超越文化的共同诗学，即普适性诗学，因此，进入他视野的所有文学理论都必然淡去其历史色彩和批评家的个性色彩。（5）刘若愚面对英语世界的读者说话，要使他人了解中国文学理论，

过分采用中国式的“道”“神”“气”“性”等词语，而不采用流行的文学理论话语，不太可能为英语世界的人们所了解，这是刘若愚建构他的中国文学理论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应该说，邱霞为刘若愚建构的中国诗学体系的辩护，已经竭尽全力。她的论述，是建立在她对刘若愚的学术思想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建立在她对中国诗学研究思潮发展的理解基础上，因此是有充分理由的。

邱霞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是介绍并评价刘若愚的遗著《语言与诗》。这部书没有译成汉语，所以邱霞用了较大篇幅介绍了刘若愚的“悖论诗学”。“悖论诗学”看起来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这个话题要从道家开创者之一的老子讲起，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可他却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庄子也是不相信语言的人，他说：“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所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就是说，人的意是不可言传的，可世人还是“贵言传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刘若愚就是把这种言说称为“语言悖论”。进一步，刘若愚认为正是这种“语言悖论”促成“诗学元悖论”，如晋代文论家陆机所表达的担忧：“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所说的：“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诗文里面总有说“言不尽意”而又没完没了地往下说的现象，这在刘若愚看来就是“诗学的元悖论”。更进一步，刘若愚认为：“获悉语言和诗的悖

论本质没有使中国诗人放弃诗歌，而是发展出一种悖论诗学。它可以概括为以言少而言多的原则。”像刘勰所说的“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司空图所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所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就是诗人解决“言不尽意”的办法，可以称为“悖论诗学”。更进一步，人们对诗要进行阐释，于是形成一种与“悖论诗学”相应的解释原则，如谢榛所说的“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这就可以称为“阐释的悖论”了。当然刘若愚的用心不仅仅是梳理中国文化中这种种言论现象，而是要再一次与西方诗人的相关说法比较，因为西方诗人如但丁、莎士比亚的诗论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邱霞在介绍完刘若愚的“悖论诗学”后，用了三节的篇幅“宏观——悖论诗学产生的哲学文化语境”“微观——诸多诗人和批评家对悖论诗学的体认”和“超越中西——对共通性的寻求”，对“悖论诗学”进行分析和评价。这些分析和评价，让读者更深入地认识刘若愚的“悖论诗学”的研究不但充满魅力，而且让读者了解到中西诗学确有诸多“交结点”，完全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从比较中，可以看到中西诗人的智慧所焕发的光辉。

邱霞的博士论文选题很有意义和价值，对刘若愚学术的评述全面而深刻，有不少地方可以看见她的心得、体会提炼和概括起来的新见。全文层次分明，层层深入。她对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有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因此谈论起来信心十足，感性和理性在她的论文中获得某种平衡。

以上就是我重读邱霞的博士论文所获得的印象，现在把它写出来，权当“序言”吧！邱霞还如此年轻，她的学

术之路还很漫长，她的学术前景一片光明。我深深地祝愿她！

童庆炳

2011年12月14日

已故著名华裔汉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中文及比较文学教授刘若愚（James J. Y. Liu, 1926 ~ 1986）生前已蜚声学界，是美国中国文学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曾获得 1971 年度古根汉姆奖助金（Guggenheim Fellowship）、1972 年度与 1982 年度美国各学会联合理事会研究费、1978 ~ 1979 年度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国家奖助金以及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奖助基金。他生前曾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及美国东方学会会员，在 1983 年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担任美方代表团副团长。

1986 年，他不幸因癌症病逝，享年 60 岁。斯坦福同事为他撰写的悼文中表示“他的离去给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留下了一项难以填补的空白”。● 欧阳桢（Eugene Eoyang）和余宝琳（Pauline Yu）也在悼文中表示：“很少有人像刘若愚一样拥有多方面的造诣，也没有人比他更热爱中国文学研究。”● 余国藩发表悼念刘若愚的词《满江红·天妒英才》。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曾与刘若愚以

● John C. Wang, Chair, Mckoto Veda, etc: Memorial Resolution James J Y LIU (1926 - 1986), 载 <http://histsoc.stanford.edu/pdfmem/LiuJ.pdf>.

● Engene Eoyang, Pauline Yu: Editorial, i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 Article, Reviews* (CLEAR), 载 <http://www.jstor.org/stable/495191>.

“东夏西刘”齐名，^①他肯定“刘教授是内行公认自成一家言的中国诗学权威”。^②刘若愚的学术成就不但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有目共睹，中国大陆学界同样也为之瞩目，在他去世时也有“美国刘若愚教授逝世”的相关报道，该报道提到刘若愚的研究“使西方对中国诗论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③

因此，刘若愚在北美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就是有广泛反响的。但由于他多年深受西学熏陶，成人后又长年生活于美国，所有学术著述用英文书写，他的研究与国内学界在一定时间内还是有一定隔阂的。尤其是他活跃于美国学界20世纪60~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正是国内学界与西方相对隔膜的时期，因此，尽管不少学者听闻其名，对于其著述的详细内容却并不完全了解，对于他面对西方英语世界所采用的阐释、批评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法，对他梳理、整合中国古代文论，进而与西方当代诗学比较，寻求世界性诗学的目标也少有感同身受的认可。

1962年，伦敦和芝加哥同时出版了刘若愚的第一部也是成名之作《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从1972年开始，该书先后有了日文、韩文、中文译本，^④并不断再

① 黄维樾曾指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刘若愚和同为华裔的专治中国古代小说的夏志清教授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各领风骚，以“东夏西刘”齐名。黄维樾：《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② 夏志清：“东夏悼西刘——兼怀许芥昱”，见夏志清：《岁除的哀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③ 周：“美国刘若愚教授逝世”，载《外国文学》1986年第7期。

④ 日文译者佐藤保，韩文译者李章佑。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中文版序），杜国清译，联经出版社1981年版。

版。此后，直到1986年逝世，刘若愚一共有8部英文专著面世。它们以年代为序分别是：《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1962）、《中国之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1967）、《李商隐诗》（*The Poetry of Li Shang - yin: Ninth - 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oet*, 1969）、《北宋主要词人》（*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ong*, 1974）、《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 1979）、《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The Interlingual Critic: 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 1982）、《语言与诗》^①（*Language - Paradox - 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1988）。

这些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和中国学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而这种影响由于某种显而易见的原因又存在一定差别。中国学界所面临的问题和读者对象与刘若愚所面对的是不同的，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即使研究同一对象，学者们在学术旨趣、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上也存在重大差异。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西交流的增多和深入，刘若愚的学术著述逐渐被翻译成中文，回流中文学界，国内学者在时代与对象的双重错位之中开始了对刘若愚著述的研究工作。

在这方面，港台学界略早于大陆学界。《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1962年问世后，中国台湾学界在1977年有了刘若愚学生杜国清的中译本，台北幼狮文化事业

① 该书原有刘若愚自己中文题名“语言与诗”，国内学界提及此书，多半直译为“语言—悖论—诗学”，笔者本拟遵从惯例，但最终还是决定尊重刘若愚本人意见，将该书名译为“语言与诗”，就像刘若愚愿意把自己的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称为“中国诗学”而不是“中国诗艺”一样。

公司出版。这个译本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先后于1979年、1981年、1985年三次再版，足见当时台湾学界对该书的热情。《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1975年问世后，1977年就有了没有经过刘若愚授权的赖春燕译本(译名《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这个译本删去了原著全部的参考书目和索引，部分破坏了原著的学术价值。因此，1981年杜国清经刘若愚同意后重新中译为《中国文学理论》出版(台北联经出版社，1981)，该译本在台湾同样风靡一时，至1998年为止，已经于1981年、1985年、1993年、1998年四次重印。1974年《北宋主要词人》问世后，台湾学者王贵苓的中译本于1986年出版(译名《北宋六大词家》，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至此，台湾学界共翻译了刘若愚的3部著作。

大陆对刘若愚著述的中译工作同样有相当的热情。《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1975)先后有两个中译本：赵帆声、王振、王庆祥、袁若娟译《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一版一印，共3600册，舍弃部分参考书目、索引)及田守真、饶曙光译《中国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一版一印，共印5700册，保留原著全部项目，并在译者前言中对该书给出了较为准确的评价)；《中国文学艺术精华》(*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 1979)有一个中译本：王镇远译《中国文学艺术精华》(黄山书社，1989年8月，一版一印，11000册)；《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The Interlingual Critic: 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 1982)有一个译本：王周若龄、周领顺译，译名《中国古诗评析》(河南大学出